

# 近楼受教似“学徒”

沈建中

施蛰存先生曾在《编印〈文物欣赏〉计划》一文中这样写过：“我这些拓片收集不易，我身后势必散失，如果这些拓片也都毁灭，恐怕以后的人永远见不到它们的形象及文字。”

这是写在《北山楼金石遗迹》三卷本前面的话。重温我受教于施蛰存先生似“学徒”的情形，思旧而感恩。

1989年秋冬间，我连续两次去北京出差，因之许久未去北山楼请教。第二次在京期间抽空游了香山，在山上闲逛外宾供应部时，想到施先生那正是本命年，且平常好古，便买了两件仿制铜器小摆设。当我返回家里，就看到先生来信，嘱我去一次。

上楼过后，先向师母请安，她即唤“阿姨”去买小笼包，关切问我为何许久没来，我奉上京城小袋果脯、小盒茯苓饼。递来到前间，先生已坐在“老位置”忙碌，我取出小摆设，他忙说“谢谢”，指着一件说“哟，这个可作镇纸”“这种小玩意呵，西安多来嘛”“下趟不要买，没啥意思”。经此一提醒，我有点惭愧，先生原来就教过我，注意训练自己挑选的眼光，他老人家的经验之谈，不觉就忘在九霄云外。况且先生平素看似忍从周遭环境，生活情感质朴，而节俭且简约是日常态度，可他过日子讲究趣味。

聊了一些我近三个月的境况后，先生告诉我《北山集古录》已开印，太高兴了。此书先是要删改“自序”开头数言；又因在新华书店征订仅一千册，没达到开印要求数。此类令先生烦恼之事，均被责任编辑周锡光先生一一化解。如今越来越感到锡光先生功德无量，有次我去成都，先生特地在他名片上写了介绍，嘱我去拜访。

接着先生说：“我收集拓片这么多年，自从朵云轩门市不供应，几乎无处可买，加上这几年病发后，不能出门，我的搜集活动基本停止，至多也就能再得零散数纸。现在可以做结束工作了。”又说：“你对碑拓有兴趣，我想叫你帮我整理拓片。”我尚未反应过来，先生忽然显出少见的严肃神情，继续说：“我考虑过了，这并不会妨碍你自己的业余爱好，每个星期只要来半天。”我虽然受过几次拓片，可算的也就是在西安旧书店、西安碑林博物馆买过数本，再就是于苏州旧书店购得一包多；又有幸得到过朱孔阳、陈兼与、边政平、包谦六、刘惜闇和周退密诸位老人家的赠本，当然都因代先生递函取物的缘故；平日先生谈碑兴致甚高，听先生讲过金石原物及传拓的沧桑“故事”，以及“大经碑”“小唐墓志”“茂手本”“未铲底本”之类术语；也教过我打开折迭拓片，托裱小纸拓片。这就是先生所说的“有些兴趣”，其实皆为我的半懂不懂。

见我犹豫，先生说这又不难的，学呀，凡事都是从不懂到懂，先试三个月，如何。随后笑道：“这是叫你做‘苦工’呵，很劳累的。”就这样我战战兢兢地接受了，先生跟我约定每周一下午，中午如没事就可过来，并关照了整理步骤、方法诸事。返回时骑在脚踏车上，想到能姑且当上大学者的“学徒”，亲炙手把手似的教育，心中不免兴奋又忐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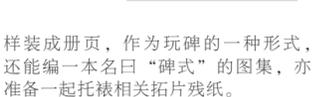
北山楼收藏的金石拓本，基本上按品种分别堆放，其中已经整合的成为有系统研究的数个专题，则另外归类分别捆扎。我是后来才渐渐明白，北山楼所藏拓本究其数量而言，无疑以造像类为大宗，其中仅龙门山魏齐造像记拓本约计六百余纸，还不包括无年月、年月泐尽、人名缺失、文句不全者。先生分为三种名目，一是造像碑，二是造像记，三是造像。如此著录分类的方法，较之以前著录家统称“造像”，要准确得多，一看名目，即可知其实物形状和拓本本体。

因为饭桌上摊不开，先生命我把拓本摊在床上，教我一份份整理，浏览大体、细加阅读、辨别判断、分类编目等步骤。有回整理一包晋小纸的龙门造像记，有一段“天大好处也”，甚有情趣，乐不可支，先生见状也笑了说，这类小纸都是小型佛龛铭记，从来不知其确数，皆为记录老百姓的事由、愿望、祈福及报恩，极有意思，如有年月、姓名就具备石刻拓本编目要素。

拓本多有残蠹损坏，先生教我用平时积存的零散陈纸，选色泽接近的，把墨纸破损残处黏贴修补，不至于裂缝越来越厉害。使用的糯米糊是先生自制的，取一点点明矾、或樟脑丸用温水溶化，倒在面粉碗里搅成糊状，再用沸水冲入，稀稠适当。我每次去时，先生已请“阿姨”拌好一小碗糯米糊让我使用，还备一把楠竹平头小镊子，专门拉平细微褶皱。傍晚走时带上数纸小拓本，一把竹起子，一只盛满糯米糊的水果广口瓶，回去后在工作室托裱，“上墙”则在文件大铁柜背面。而此多年前，先生曾搜集过一些废弃的古碑残纸，每纸写上字迹一尺左右见方，准备每纸至唐宋的碑版字



北山楼藏汉瓦当拓本之飞鸿延年瓦



样装成册页，作为玩碑的一种形式，还能编一本名曰“碑式”的图集，亦准备一起托裱相关拓片残纸。

其实先生按品类存放所藏，实属无奈之举。把汉碑、魏碑、晋碑、南北朝碑、隋唐碑和摩崖巨刻，均存放大十来个大小不一的纸板盒内；造像、经幢、塔铭、墓志之类，都是二三十份用“申报纸”捆为一束；再小一些的题刻、题名以及拓片小纸，利用前寄过的大号牛皮信封，裁开裹成纸包，一包包的很多；一般都在拓本纸背粘贴先生书写题名年代的毛边纸小签条。先生说，从前藏家都印制专用拓片袋（先生又叫“碑袋”），可自己没有这个条件；但近年买不到拓片，又写小文章得了不少稿费，有余钱买牛皮纸，制作拓片袋，一份份的整齐存放。便嘱我有空去纸行看看。

我买来五张双面牛皮纸。想不到先生说，这纸太好了，可这么多拓片，价钱吃不消的。这让我转想一想，我每次来，招待的点心可买三五张大纸，先生却重重地说：“选两个两粒事体，弗搭嘎哦。”接连几天，我跑了几家纸行，又购得十来张不同的单面牛皮纸，先生看了，还嫌价钱贵，先用这些好纸做了一批较大的碑袋，专门存放汉唐巨幅。有天，我乘15路车在浙江北路、天目路终点站下车，恰好看到一帘南纸店，进去见到一种较薄的竹帘条纹包书纸，价格便宜。先生看了高兴得很，我便在一个中午骑着脚踏车一下子采购五十张。这种纸用完后又买了许多几次，但厚薄颜色皆有差异。

在先生布置下，自制拓片袋施行流水作业，先从造像类拓本开始。根据先生设计大小号规格的样袋标准，按每批大张尺寸，确定裁纸开数。我把大张纸裁开，再和先生一起折成袋式，“阿姨”刷糯米糊粘贴背脊中下两条封口。等糯米糊干透，先生按我备好的拓本，在袋正面书写拓本名称、年代等，偶尔写错，就裁毛边纸或宣纸签条重写上粘上。再把拓本一一装入袋内，先生存有十来副线装书木夹板，恰好派上用场，配好布带，一般三十左右一扎，先生还命我正书签条粘木夹板上；余下的就用硬纸板替代，也是三十上下夹捆起来。

而今，当年自制的几种规格纸质不同的拓片袋，已与北山楼所藏拓本一同流散，有时见拍卖图录刊载，有时在继起藏家手里过目，真有点像在马路偶遇散散多年的亲朋，似如梦境，悲欣交至。尤其在拍卖图录上见到两本，一《永建五年食堂画像题字》，独山莫氏影山草堂、岷县商笙伯安庐、扬州吴毅翁师李斋题藏；一《潘城隶书参军杨居墓志》，志盖有图像，山阴吴氏钟玉书室藏本。因为有好几年，先生已把拓本视为艺术品，一直把这两本放在写字桌抽屉里，随手赏玩，讲讲趣事，兴味盎然。

转眼1991年夏间，造像类拓本的整理基本完工，也作了记录。年已八十五六高龄的先生都没得暑假，依旧工作不息。然后连续三四年暑假，皆因先生住院、获奖等原因，整理拓片工作临时暂停，我也有长短不一的“暑假”，先生就给我布置功课，开个书单命我读些入门基础书，还有必备左右的工具资料书，像《中国历史纪年表》《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》《订正六书通》《金石萃编》《碑别字新编》

元初砖，会稽周氏凤皇专斋传拓本



广野将军和国仁墓碣局部，附会稽周氏知堂题记



山集古录《金石丛话》，其他金石著述都因各种原因而束之高阁。

1996年后，我把手头正在进行的摄影专题赶紧束起，遂告别照相机，这样节省大量业余时间，可更加专心当“学徒”。每周仍一两个下午协助整理，而誊稿则利用晚上时间，一晃五六六年头，眼看积稿成堆，曾构想在继《北山集古录》印行后，能编一本左文右图形式的金石杂文。这一想法得到先生肯定，他说，“像《西清古鉴》《两罍轩彝器图释》《斋斋集古录》《居贞草堂汉晋石影》这类图录形式的书早已有，我也想把自已搜集的拓本编几本出来。那你就编一本，试试看。”

那仿佛“学徒”的日子如歌似梦，某日竟做起大头梦。午后迷惑，楼南窗外，先生吸Quai D'Orsay，我依Bovril，对坐默然。顷刻，退步壮汉犹如下凡而来，抱拳曰：先生，您早于1930年代就向国人介绍辟卡校艺术方法，吾师啸声让鄙人来致敬。我忙叫：小弟曾谒见啸声老师。先生却道：奇怪哉，这位啸声如何晓得吾，他可是大名鼎鼎的西方艺术史家；而吾，只是非正统、故压抑着决不提吾名，用的是闷杀办法。唉，此感仿似曾与古时剑客言及。退步壮汉长叹：啸声师正当当年，当然想干一番，可半数老少爷们都端着地盘式的脸，忽然来个有才学有抱负的家伙，你想干嘛？知道诗人嫌吗，也许不知，也许了然；反正讨做物的人正像啸声师那样，梗着脖子，挑明不吃这一套。哈，退步壮汉说得逗人，倏然无影无踪，发笑戛然而止，梦已煞却，晨光明媚。

后来，先生又命我把这两本书都校对一过。其实在样书甫一寄来，先生即校阅并在新书上作了订正，而眼下是特地布置给我的作业。我逐字逐句地校读，由于缺乏文字学、金石学诸多常识，仅检出几处明显的误字。当我交给先生时，他边翻看边笑道，还有很多错处没能校出。即为我一页页检查，连排版字体字号、行距空格的误处，皆作批改。我至今保存着经先生批改的校本，《金石丛话》还是利用一本装订误版。如此训练，让我受用不尽。

纵览先生的拓学生涯，“整理编录”是他研究学问的一项重要创造性的工作。我曾读过不下十余篇先生撰写的有关编辑出版的“计划”“设想”“拟目”，像“金石杂著”“历代文物拓片图鉴”“秦汉石刻图录”“魏晋南北朝碑刻图录”“陕西石门摩崖留影”“洛阳龙门造像图录”“历代碑刻墨影”，皆有约稿及投稿的经历，最后都不了了之。所幸逃生的“词学集刊”“百花洲文库”“外国独幕剧选”，至今显现学术内涵、文化质素上的出版价值，其编辑理念、编辑方法的气象格局，形成“北山楼”治学的一种特质。

大约在1992、1993年间，先生再谋求印行《唐碑选》，亦不果。我知道一些先生心里的憾事，先生这样写过：“我这些拓片收集不易，我身后势必散失，如果这些拓片也都毁灭，恐怕以后的人永远见不到它们的形象及文字，我这本书目的在保存拓片形象。”（《编印〈文物欣赏〉计划》1991年8月4日）可助有力，好歹他也习惯了，仅在与老友陆谷葑谈笑间，不免有点苦涩味，“写好的，原稿包好，攒在阁楼上算了”（见原著《从“出土文物”到“杰出贡献”》）。然而，先生无论处在何种境遇，从来没有放下手中的笔，写成多部书稿，除了那时印行的《水经注碑录》《北



山集古录《金石丛话》，其他金石著述都因各种原因而束之高阁。

1996年后，我把手头正在进行的摄影专题赶紧束起，遂告别照相机，这样节省大量业余时间，可更加专心当“学徒”。每周仍一两个下午协助整理，而誊稿则利用晚上时间，一晃五六六年头，眼看积稿成堆，曾构想在继《北山集古录》印行后，能编一本左文右图形式的金石杂文。这一想法得到先生肯定，他说，“像《西清古鉴》《两罍轩彝器图释》《斋斋集古录》《居贞草堂汉晋石影》这类图录形式的书早已有，我也想把自已搜集的拓本编几本出来。那你就编一本，试试看。”

那仿佛“学徒”的日子如歌似梦，某日竟做起大头梦。午后迷惑，楼南窗外，先生吸Quai D'Orsay，我依Bovril，对坐默然。顷刻，退步壮汉犹如下凡而来，抱拳曰：先生，您早于1930年代就向国人介绍辟卡校艺术方法，吾师啸声让鄙人来致敬。我忙叫：小弟曾谒见啸声老师。先生却道：奇怪哉，这位啸声如何晓得吾，他可是大名鼎鼎的西方艺术史家；而吾，只是非正统、故压抑着决不提吾名，用的是闷杀办法。唉，此感仿似曾与古时剑客言及。退步壮汉长叹：啸声师正当当年，当然想干一番，可半数老少爷们都端着地盘式的脸，忽然来个有才学有抱负的家伙，你想干嘛？知道诗人嫌吗，也许不知，也许了然；反正讨做物的人正像啸声师那样，梗着脖子，挑明不吃这一套。哈，退步壮汉说得逗人，倏然无影无踪，发笑戛然而止，梦已煞却，晨光明媚。

之后，先生又命我把这两本书都校对一过。其实在样书甫一寄来，先生即校阅并在新书上作了订正，而眼下是特地布置给我的作业。我逐字逐句地校读，由于缺乏文字学、金石学诸多常识，仅检出几处明显的误字。当我交给先生时，他边翻看边笑道，还有很多错处没能校出。即为我一页页检查，连排版字体字号、行距空格的误处，皆作批改。我至今保存着经先生批改的校本，《金石丛话》还是利用一本装订误版。如此训练，让我受用不尽。

纵览先生的拓学生涯，“整理编录”是他研究学问的一项重要创造性的工作。我曾读过不下十余篇先生撰写的有关编辑出版的“计划”“设想”“拟目”，像“金石杂著”“历代文物拓片图鉴”“秦汉石刻图录”“魏晋南北朝碑刻图录”“陕西石门摩崖留影”“洛阳龙门造像图录”“历代碑刻墨影”，皆有约稿及投稿的经历，最后都不了了之。所幸逃生的“词学集刊”“百花洲文库”“外国独幕剧选”，至今显现学术内涵、文化质素上的出版价值，其编辑理念、编辑方法的气象格局，形成“北山楼”治学的一种特质。

大约在1992、1993年间，先生再谋求印行《唐碑选》，亦不果。我知道一些先生心里的憾事，先生这样写过：“我这些拓片收集不易，我身后势必散失，如果这些拓片也都毁灭，恐怕以后的人永远见不到它们的形象及文字，我这本书目的在保存拓片形象。”（《编印〈文物欣赏〉计划》1991年8月4日）可助有力，好歹他也习惯了，仅在与老友陆谷葑谈笑间，不免有点苦涩味，“写好的，原稿包好，攒在阁楼上算了”（见原著《从“出土文物”到“杰出贡献”》）。然而，先生无论处在何种境遇，从来没有放下手中的笔，写成多部书稿，除了那时印行的《水经注碑录》《北

之后，先生又命我把这两本书都校对一过。其实在样书甫一寄来，先生即校阅并在新书上作了订正，而眼下是特地布置给我的作业。我逐字逐句地校读，由于缺乏文字学、金石学诸多常识，仅检出几处明显的误字。当我交给先生时，他边翻看边笑道，还有很多错处没能校出。即为我一页页检查，连排版字体字号、行距空格的误处，皆作批改。我至今保存着经先生批改的校本，《金石丛话》还是利用一本装订误版。如此训练，让我受用不尽。

纵览先生的拓学生涯，“整理编录”是他研究学问的一项重要创造性的工作。我曾读过不下十余篇先生撰写的有关编辑出版的“计划”“设想”“拟目”，像“金石杂著”“历代文物拓片图鉴”“秦汉石刻图录”“魏晋南北朝碑刻图录”“陕西石门摩崖留影”“洛阳龙门造像图录”“历代碑刻墨影”，皆有约稿及投稿的经历，最后都不了了之。所幸逃生的“词学集刊”“百花洲文库”“外国独幕剧选”，至今显现学术内涵、文化质素上的出版价值，其编辑理念、编辑方法的气象格局，形成“北山楼”治学的一种特质。

## 纪念

记得多年前与老友逛复旦旧书店，淘到过一本复旦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旧书《怎样学好大学文科》，在今天读来，颇具时代价值。这本朴素的小书，是由当时复旦人文社科大家们写作的读书方法文集，收录了当时中文系郭绍虞、朱东润、王运熙、胡裕树，历史系周谷城、杨宽、金重远，以及哲学、经济、法律、新闻等多学科的知名教授与中青年教师们总结的当时颇为时兴的“读书法”。虽然这本简约低调的小书差不多早就为人忘记，但其内容对今天“怎样学好大学文科”依然颇为奏效。

做古代文学历史研究，离不开邓广铭先生在五十年代提出的“四把钥匙”理论：职官、历地、年代、目录；到了八十年代，人们开始不满足于此。杨宽就提出了新研究领域所需要补上的内容，如研究历朝生产关系时需要深入科学技术史的研究，对先秦上古史不仅要有考古及出土文献的研究，还要有相当古文字的补充（杨宽《怎样学好祖国的历史》），这些心得付诸任何时代的人文社科都不算过时。同时，对当时所有文科生来说，英语应该是一项重要课程，因为了解世界最新的文艺、古典与现代哲学、历史、地理以及国际新闻、情报企业管理等各方面资料动态，都需要有相当的英语阅读能力（钟桂芬《文科学生如何过好“英语关”》），想到这是说给八十年代初的复旦学子的话，可谓相当超前了。而金重远则告诉大家，学好世界史同时要具备经济文化哲学宗教自然科学等宽阔的知识面，尤其文学作品会提供相当大的帮助，比如对1812年法俄战争有感性的认识，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就是很好的入门；而要了解滑铁卢战役，则可以通过司汤达《巴尔莫修道院》与雨果的《悲惨世界》，而作者对1832年由拉马克将军之死引起的巴黎起义最早的认识，便是从《悲惨世界》里的街垒战中而来，文史不仅不分家，伟大的文学作品还能帮助世界史的学习变得更活更扎实（金重远《学习世界史的点滴感受》）。

书中还有一些“我是怎样学习”系列的文字，同时兼有读书法与自传体的意思，甚至有一些偶有“凡尔赛”的味道。比如本书主编之一周谷城先生，无疑是历史学的名家，他在文中着重谈了自己怎样研究世界史，最初在中山大学教书时，周谷老是教社史史的，因为每周课时少，闲暇时候增加了史学理论的学习，包括读摩尔根、恩格斯、黑格尔等人的著作打基础，后来去暨南大学教书时仍然上课有余力，便动了编写《中国通史》的念头，但通史出版后的1939年他被当局指出有马克思主义倾向，不让他在《中国通史》课程，便被“发配”去教世界史，然后便促成了《世界通史》；这门课一教也就教了一辈子（周谷城《我是怎样研究历史的》）。另一位主编郭绍虞先生讲自己的文学批评史，是延续黄俄、刘师培、陈中凡等人的批评史教学实践而得，又结合自己早年在福建协和大学、开封中州大学（即日后河南大学）的教学经历而成（郭绍虞《我是怎样学习中国文学批评史的》）。不过郭先生在文中回忆自己早年任教商务印书馆“尚公小学”的经历更为有趣，他不仅为小学语文老师写过一本《小学文法》，还为小学体育老师朋友写了一本《中国体育史》，

成为体育专科学校的教材，实在让人敬佩不已。朱东润先生则讲述了自己传记文学的研究经过，自抗战时，他便对中外传记文体开始了关注与写作，尤其朱先生创作的多部古代人物传记作品，都与抗战时期的时政与人物有关。不过，朱先生还是提到，是不是只有伟大的人才拥有传记，普通人不配拥有呢？答案是肯定的，朱先生记录了一位在宝山路谈“忆苦思甜”时遇到的广西妇女与参建黔桂铁路的丈夫的故事，完全可以写一部非常生动的传记（朱东润《我是怎样研究和写作传记文学的》）；这也与朱先生为亡妻所立《李方舟传》的旨趣有所相通。

全书可读性最强的文字，可能就要数朱维铮先生的《怎样读书》了，当时尚属中青年教师的朱先生便用老辣的文笔，划分出“被动与自觉”“见树与见林”等读书方法的层次，遍引史、汉、鲁迅、王国维、《资本论》中诸家读书论的观点，读来酣畅淋漓；而在解答“怎样读书”之外，文中提到的“文科生式”的困境则更令人印象深刻：对于天天同图书资料打交道的文科生，怎样读书竟还成问题；成天埋头读书的文科生人变呆了、体质差了，学问长进却很慢；不会独立思考，不会研究问题，变成两脚书橱等等等等。虽然朱先生全篇都在为这些问题找解药，但即使今天的很多文科生似乎都不易摆脱这一魔咒。这本四十年前讲“读书法”的小书的价值，并不仅仅在于今天读来依然有可资借鉴的闪光点，还在于“文科生”的读书问题久已有之，并非一两本“读书法”可以解决的，朱先生文中结尾引了马克思的《白》里“喜欢做的事”：嗜书本——可算做对当代文科生的忠告。毕竟，勤奋永远不会过时的，勤奋即是“读书法”，勤奋即非“文科生”。

（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）

王启元

## 文科生与『读书法』

成为体育专科学校的教材，实在让人敬佩不已。朱东润先生则讲述了自己传记文学的研究经过，自抗战时，他便对中外传记文体开始了关注与写作，尤其朱先生创作的多部古代人物传记作品，都与抗战时期的时政与人物有关。不过，朱先生还是提到，是不是只有伟大的人才拥有传记，普通人不配拥有呢？答案是肯定的，朱先生记录了一位在宝山路谈“忆苦思甜”时遇到的广西妇女与参建黔桂铁路的丈夫的故事，完全可以写一部非常生动的传记（朱东润《我是怎样研究和写作传记文学的》）；这也与朱先生为亡妻所立《李方舟传》的旨趣有所相通。

全书可读性最强的文字，可能就要数朱维铮先生的《怎样读书》了，当时尚属中青年教师的朱先生便用老辣的文笔，划分出“被动与自觉”“见树与见林”等读书方法的层次，遍引史、汉、鲁迅、王国维、《资本论》中诸家读书论的观点，读来酣畅淋漓；而在解答“怎样读书”之外，文中提到的“文科生式”的困境则更令人印象深刻：对于天天同图书资料打交道的文科生，怎样读书竟还成问题；成天埋头读书的文科生人变呆了、体质差了，学问长进却很慢；不会独立思考，不会研究问题，变成两脚书橱等等等等。虽然朱先生全篇都在为这些问题找解药，但即使今天的很多文科生似乎都不易摆脱这一魔咒。这本四十年前讲“读书法”的小书的价值，并不仅仅在于今天读来依然有可资借鉴的闪光点，还在于“文科生”的读书问题久已有之，并非一两本“读书法”可以解决的，朱先生文中结尾引了马克思的《白》里“喜欢做的事”：嗜书本——可算做对当代文科生的忠告。毕竟，勤奋永远不会过时的，勤奋即是“读书法”，勤奋即非“文科生”。

（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）

之后，先生又命我把这两本书都校对一过。其实在样书甫一寄来，先生即校阅并在新书上作了订正，而眼下是特地布置给我的作业。我逐字逐句地校读，由于缺乏文字学、金石学诸多常识，仅检出几处明显的误字。当我交给先生时，他边翻看边笑道，还有很多错处没能校出。即为我一页页检查，连排版字体字号、行距空格的误处，皆作批改。我至今保存着经先生批改的校本，《金石丛话》还是利用一本装订误版。如此训练，让我受用不尽。

## “暗物质之母”薇拉·鲁宾

编译/本报记者 于颖

薇拉·鲁宾（1928—2016）从不被称为暗物质的发现者。她致力于星系旋转曲线的测定，正是这一研究揭示出占据宇宙物质85%之多的暗物质。事实上，她曾试图阻止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新闻团队在报道中使用“发现”一词，而建议修改为“她的观察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”。

近日，杰奎琳·米顿和西蒙·米顿的《薇拉·鲁宾的一生》（Vera Rubin: A Life）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，系这位著名天文学家的第一本长篇传记。书中披露了她珍藏一生的大量信件，还有论文旁的批注、采访及其他档案，这些材料直到最近才对研究人员开放。米顿夫妇还借助自身在天文学方面的专业知识，为读者解释薇拉·鲁宾的发现及其意义。

薇拉·鲁宾原姓库珀，1928年7月23日出生于美国费城，父母都是东欧移民，在贝尔电话公司工作时相识相恋。1938年，薇拉跟随家人搬到华盛顿，因为睡在窗边，她开始抬头仰望夜空。她自己搭建了一个小型望远镜，一有空就观星星、拍星轨，还加入了本地天文爱好者协会。但她的好学精神在学校并未得到鼓励——虽然薇拉在英语课上写的每一篇文章都与天文学有关，但当时的物理老师充满性别偏见，在薇拉后来的描述里，那时的物理实验室无异

于“一场噩梦”。

之后，薇拉入读瓦萨学院。瓦萨学院有一座小型天文台，并有培养女性天文学家的传统，美国第一位女性职业天文学家玛丽亚·米切尔（Maria Mitchell, 1818—1889）就曾在此执教。1948年，薇拉作为当年唯一一名天文学专业的本科生从该校毕业。

毕业后不久，薇拉嫁给了鲍勃·鲁宾（Bob Rubin），当时他正在康奈尔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，薇拉于是拒绝了哈佛大学研究生院的邀请，也转去康奈尔读硕士。1954年，她在乔治敦大学完成博士学位。作者在传记里特别指出，薇拉之所以能专心投身于天文学的探索，得益于双方父母在背后的默默支持，毕竟这个小家庭育有四个小孩。

相比教学，薇拉更希望潜心于天文观测（尽管当时的天文观测站甚至缺乏女性宿舍和卫生间）。在乔治敦大学工作了10年后，她加盟了卡耐基研究所，直到退休。2005年，77岁时，她发表了自己最后一篇论文。

米顿夫妇在传记中也呈现了薇拉的人际脉络图，勾勒了她与不同阶段的导师、研究所同事，以及天文学界人物之间的关系。将薇拉的故事放在人类研究星系的历史长河中去看，无疑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20世纪天文学发展的独特视角。例如，在薇拉和卡耐基同事

在 读



1947年，在瓦萨学院天文台观测的薇拉·鲁宾